

陆文夫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LU
WEN
FU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17.2
L866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陈文夫



692421



A004777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赵水金

陆 文 夫

Lu Wen F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5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插页 4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200

ISBN 7-02-001187-X/I·1103 定价 5.45 元

文学也可以游戏人间，
人间就把它当作游戏。

陆 文 夫



1982.5.23



作 者 像

吃喝之外

陆文夫

我写过一些关于吃喝的文章。对于大吃大喝，小吃小喝，没吃没喝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等到后来，我觉得新多人在吃喝方面都忽略了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大家只注意研究美酒佳肴，都忽略了吃喝时的那种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境、处境等等。此种虚词不在酒菜之列，菜单上当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讲，虚的往往比影响着实实的，特别决定着对某种食品久远、美好的记忆。

五十年代，我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採訪，时近中午，饭馆都已封炉打烊，大饼油条也都是凉的。忽逢一家小饭馆，说是饭也没有了，菜也卖光了，只有一条桂鱼养在汤里，可以做个鱼汤脚以充饥。我觉得此乃上策，便进入那家小饭馆。

这家饭馆临河而建，正确地说是在店门后街上，小楼是架在湖口的大河上。房屋下面架空，可以系船或作船坞。是水乡小镇上常见的那种河房。店主先领我从店堂内的一个窟窿里步下石阶头，从河里拎起一个扁圆形的瓷壶，塞

手 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微弱的光(代序)

陆文夫

从某种角度来看，作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煎熬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按照作家的愿望来实现，人类的灵魂也不完全是由作家塑造的。可是他们总是不自量力，忧心忡忡，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心血注进油盏里，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他们很少满足过，没有平静过，一种自我的骚扰贯穿了全部的生命线，烦恼大于安慰，感情的过剩有时可以造成危机。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却没有一个梦是想到要当作家的。这倒不是说我那时便知道作家不是什么美好的职业，相反，我认为能够写书的作家太了不起。因为我从七岁开始便读孔夫子的书，能够写书的孔夫子是圣人，连我的老师都要对着他的牌位叩头。不幸的是我从小便爱幻想，而幻想总是和文学有缘的，只有文学可以为一个孩子提供那么简便而又无穷的想象的天地。

想象也是需要诱发的，最先诱发我的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长江。我于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长江离开我家的大门不到二百米，沙沙的涛声每日催我醒来，伴我入睡。我每天都要坐在江堤上呆望，望着那些轮船和帆船从天边出现，又慢慢地消失在天的尽头。这

就引起了我的遐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不出来，东望是水天一色，西望是水色一天，一片广漠的空白，遐想无所依附。

文学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它使我的想象有了依附，有了发展。文学是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开始有神仙鬼怪，接着便有爱情、有友谊、有欢乐、有眼泪、有卑鄙的勾当，有崇高的行为，有强盗的行径，有正义的事业。这一切都使我神魂颠倒，都想去经历经历。但是，文学所描绘的事物都不在我的家乡，也不在我读初中那个小县城里。最远的是在海外，最近的也在上海、南京和苏州。苏州我可以去，我的姨妈家在苏州做生意。

一九四四年的春夏之交，我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闯进苏州来了。苏州号称人间的天堂，她的美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她象一部历史，一首古诗，是各种美妙故事的发源地，这些故事好象都曾经在哪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的。一个梦游天地的青年终于在大地上找到了落脚点，从此我便爱上了苏州，并在苏高中就读了三年。

三年之后我发现苏州是一个明媚而清澈的湖，污垢却都沉积在清水的下面。苏州有许多女人长得很漂亮，拉着她们走的黄包车夫却是一个个瘦骨伶仃，气喘嘘嘘的老头。天堂是建筑在地狱的上面。那些年正是国民党的统治腐败到极点的时候，苏州那美丽的外表再也掩盖不住人民的疾苦，我的兴趣和想象便因此而转向了社会，想为求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奋斗，让人人都能生活在天堂里。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升学，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准备豁出命来打游击，不料游击还未打，国民党已经全面崩溃，我随军渡江又回到了苏州，在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前后做了八年。那八年

正是我们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热忱地为新社会唱赞歌，写新闻，写通讯，写社论。唱着唱着还觉得不过瘾，因为新闻和通讯都必须真实，好象嗓门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忽然之间异想天开，何不做篇小说来试试呢，小说也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可以把真实加以想象而求得艺术的完美。这时候我再也不把作家当圣人看待了，因为作家和记者之间只隔了一层板壁。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说干就动手。老实说，想写小说一方面是为了替新社会唱赞歌，一方面也有点弄着玩儿，想出点儿风头，没有想到这文学是个危险的游戏。

我起早带晚，中午不休息，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做了一个短篇，寄到上海的《文艺月报》去。首投未中，却碰到了一个好编辑，他写了一封三张信纸的退稿信，说稿子虽然不能用，但他却从稿子中看出我是有创作才能的，鼓励我继续写下去。那时候我欢喜戴高帽子（现在有点吓），编辑说我有才能，那是不会假的，继续干下去！干了许久又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叫《荣誉》，《文艺月报》发表在显著的地位，而且还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我写得怎么好等等。那时候写小说的人很少，能有一篇小说获得好评便可以算作家了，我不久就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华东分会，并且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结识了一大批在五十年代初露头角、而今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名声的作家。这下子有点欲罢不能了，跟着又来了一个短篇，题名《小巷深处》。发表之后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那时的小说都是写打仗和生产，写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写英雄主义。我写的却是一个妓女的新生和爱情的波折，写的是人道主义，而且文笔还有点优美，用那时的话说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很浓的。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把江苏省在文学创作上稍有成

就的人都搜罗进去，我也不当新闻记者了，到南京当专业作家去。

真的要以为作家为职业了，这事儿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对社会负有何种责任，应该怎么写，写些什么东西？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现在著名的作家高晓声、方之（已故）、艾煊、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等人。我们几个人一研究，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同时认为过多的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话现在讲讲还可以，在二十八年前讲这些话简直是胆大包天！我们不仅讲，而且还准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用艺术来实现我们的主张，同时为《探求者》写了发刊词，把这些主张都明明白白地写在里面。刊物还未办成，就开始了五七年的那一场反右斗争。这下子闯下大祸了，我们被打成反党集团，批判、斗争、检查、下放。陈椿年送进劳改农场，高晓声回老家去种田，艾煊到西山去种果树，方之和叶至诚去大炼钢铁，我回苏州到机床厂里去当学徒，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颇为有名的《探求者》事件。我第一次当专业作家只当了不到半年，便一个筋斗栽到底，作家实在是个并不美妙的职业。

我在厂里当了两年的车工，真心诚意地向工人们学习。我觉得作家是人，工人也是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而且默默无闻，那劳动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很值得知识分子学习。那年头，当了个右派、反党分子等等日子是不好过的，见了熟人也不敢点头。工人们可不管这些，只要你不刁钻、能干活，他们就亲近你、称赞你，并在暗中对你的不幸表示同情。我工作得不错，工人们都称

赞，几次评为先进，得奖得过一套卫生衫和一个大脸盆，实乃不幸之中之大幸。谁知这大幸之中又孕育着不幸，真是祸福难明……

到了一九六〇年的夏，三年困难之后实行经济调整，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了，江苏省又成立专业创作组。因为我在工厂中劳动得不错，改造得有成绩，为了体现政策，又把我调上南京，又当起专业作家来了。我吃一堑长一智，小心谨慎，不敢得意忘形。可是那时的小说已经很难写了，阶级斗争第一，人物都被拔高到足有五、六米，胳膊和大腿都比普通的人大几倍。我不愿意去凑这种热闹，因为我自己只有一米七四多一点，那样的巨人我在生活中也没有看见，也许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吧，可我那时连飞机还没有坐过呢！于是我便写普通的劳动者，写工人，写劳动，写劳动中的某种哲理。由于我在工厂中劳动了两年多，有体会，写起来也别开生面，产量也是不少的，这一来又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评论我的文章也都是说好话的。这不是很好了吗？慢点。

到了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了，又要大搞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小说没法写了。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很着急，便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研究到底怎么写法才好。茅盾同志和许多著名的老作家、理论家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我也去了。在会上，茅盾同志对我的写法很有兴趣，认为也是无路之中的一条路，于是便在《文艺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评价我的小说。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得不是当口，那正是批评文艺界已经走到修正主义边缘的时候。陆文夫何许人也？一查，五七年的“探求者”、反党分子。完了，此人重登文坛，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批！

这一次可批得够呛的了，比五七年要厉害几倍，前后长达半

年，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江苏的报纸用两个整版的大文章把我批深批透。那时候我的大女儿正在读小学，看到大文章便会血压升高，昏昏迷迷。我也昏迷了，怎么昨天还说我写得如何好，今天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文艺界还讲不讲理！当然，批判我的人（他们也是奉命而作）也有理，说我是写中间人物，写阴暗面，写人道主义，不写阶级斗争，还是《探求者》的老观点，所以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五七年的事情翻出来重批。我开始是想不通，后来想通了便感到一种幻灭，差点儿从灵谷寺塔上跳下去。所以没有跳，是想看看这文艺究竟如何向下发展。我自己不能写了，也不想写了，只是想看看而已。六五年的夏天我被赶出文艺界，又回到了苏州，在一家纱厂里当修机工，不看书更不写小说，星期天喝半斤黄酒，低唱《贝加尔湖之歌》，这是当年的一支中国红军被逼退入苏联境内时所作的歌，我唱起来声音嘶哑，热泪满面，孩子们听到我唱便从房间里逃出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遭殃了，抄家、批斗、挂牌、游街、请罪，一样不少，行礼如仪。但我自己倒也不感到有太多的痛苦了（当然也不舒服），只担心我们国家的这一场浩劫如何了结？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破坏起来却十分容易，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幸福社会到哪天才能实现！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工人，会干活儿总是有饭吃的。不然，工人不能让你当，叫你当农民去。六九年底把我的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要在五天之内离开苏州。一个曾经想建设天堂的人，又被从天堂里放逐出去。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了江苏北部的黄海之滨，那里当时是江苏省最艰苦的地方，被下放者称之为江苏的西伯利亚。我在那里一住便是九年，造茅屋，种自留田，其余的时间便是和一同下放的老朋友喝酒聊天，纵论天下大事，把我们的经历和曾

经读过的马列主义重温一遍。把国家和个人所走过的道路都作了一些总结。从我个人来说这九年也没有完全浪费，思考了不少问题。那时候我们认为“四人帮”迟早会垮台，但是难以预料早在什么时候，迟又迟到哪天，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得见！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我和朋友们痛饮了三天之后把钢笔找出来了，我要写小说了，创作的冲动象一股热流在寻找喷口。可是我停笔已经十三年了，许多常用字都已经忘记，简直想不起小说是怎么写法的。我象一个卧床十三年的病人一样，爬起来扶着墙壁走路，先胡乱地写点散文、剧本作为练笔，慢慢地把遥远的记忆唤醒来，然后使足力气写了个短篇。这时候《人民文学》也已经复苏，一些老编辑在到处寻找那些下落不明的老作者，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短篇一个已经写好了放在案头，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献身》，后来获得了一九八〇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的一家又从黄海之滨回到苏州来了，回到苏州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我又当起专业作家来了，从二十五岁起开始写小说，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跌倒爬起，三起两落，最后才落定了作家这个并不美妙的职业，你看这作家可是好当的！

严格地说我从五十岁起才算真正地写小说，前面的二十五年只能算是艺术的练习和生活的磨练。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年间，我大约发表了不到四十万字的中篇和短篇，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次中篇小说奖。但我每次到北京领奖时，心里总有点难过，总觉得有许多朋友没有能来，他们有的在苦难中不幸去世，有的在苦难中把艺术的才华磨灭。因此我总觉得负有一点点什么历史的责任，有义务写出各种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

变迁，把自己的心血和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油盏内，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让那些走向幸福的人们在夜行中远远地看到一点光时，感到一点安慰：快了，前面又到了宿营地。

1985.3

目 次

微弱的光(代序)	1
----------------	---

小 说

临街的窗	1
门铃	19
万元户	33
围墙	56
还债	76
唐巧娣翻身	87
特别法庭	104
小贩世家	118
美食家	133
井	222
毕业了	288
清高	336

主要作品目录	356
--------------	-----

附录

临街的窗

三山街上没有山，也不能叫街，用现在的眼光来打量，只能算作一条比较宽阔的小巷，可在清朝却是通衢大道，能走八人大轿。就在三山街向南拐的地方，在那转弯角上有三间小楼。那楼大概还是清代的，楼上有一排长窗，总共十二扇，每扇有一尺多宽，却有一丈多高，两头有花板，当中嵌玻璃，梅花形的窗格棂儿衬在玻璃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十二扇长窗被一分为二，楼上住了两户人家，每家有窗六扇。窗子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不仅透光透气，还能透出个中的许多消息：

西六扇长窗没有什么看的，引不起人们的遐想，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里面住了一个头发花白，腰背佝偻的小老头。此人有时候也临窗生兴，唱几句地方戏，板眼十分正确，那声音却能叫人起鸡皮疙瘩的。

东六扇长窗就美了，有粉红色带黄花的丝质窗帘，轻风撩开了窗纱，可以见到一位美丽的少妇当窗梳头，那长波浪的青丝一会儿披散在双肩上，一会儿又随着那仰起的脖子甩向脑后，使得窗下的行人脚步也有点迟疑。这少妇有时候也唱几句地方戏，嗓音甜美圆润，听了叫人舒心畅气。

三山街上的人对这十二扇长窗都很熟悉，说是里面住了两家吃开口饭的。所谓吃开口饭便是唱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演员，时髦的职业。